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廉政文化文库

宋庆森◎著

通俗读物卷

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

——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通俗读物卷

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

——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

宋庆森◎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宋庆森著.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3

(廉政文化文库)

ISBN 978 - 7 - 5174 - 0089 - 9

I. ①卿… II. ①宋… III. ①反腐倡廉—研究—中国 IV. ①D6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7996 号

廉政文化文库

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

宋庆森 著

责任编辑：陶 莹

责任印制：李 华

出版发行：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100053)

编辑部：(010) 59594615 发行部：(010) 66560936

出版部：(010) 59594625 门市部：(010) 66562755

邮购部：(010) 66560933

网 址：www.lianzheng.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2.75

字 数：172 千字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5174 - 0089 - 9

定价：3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出版说明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2010年1月，中央纪委、中央宣传部、监察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积极推动廉政文化产品的创作和传播，整理、挖掘古今中外的廉政文化资源，建设廉政文化作品共享库。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全党全社会深入贯彻十八大反腐倡廉精神、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背景下，我们组织推出了这套《廉政文化文库》。

本文库首辑分为基本理论卷、道德修养卷、通俗读物卷三卷，总计18册。基本理论卷包括《廉政文化建设要论》、

《廉政文化概论》、《中国廉政法制史研究》、《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简史》、《国外廉政文化概略》、《廉政文化与民俗》；道德修养卷包括《干部从政道德读本——中国经典的启示》、《干部治家读本——中外治家名言点评》、《干部诚信建设读本——中外诚信名言点评》、《官德——领导干部道德修养读本》、《修养关系成败——党员干部修养纵横谈》、《高台驻足——一个领导者的人生感悟》；通俗读物卷包括《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中华廉吏传》、《廉诗三百首》、《廉政韵文碑刻》、《廉政格言警句》、《廉洁持家格言漫画》。从指导思想和编写风格上看，本文库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坚持正确导向，突出全面性、权威性。文库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围绕反腐倡廉建设，梳理廉政文化各方面内容，突出廉政文化精华，各卷之间各有侧重，互为补充。

二是注重文化传承，融思想性、学术性和知识性于一体。文库以翔实文献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力争编写出系统、扎实、权威的廉政文化理论著作以及雅俗共赏的廉政文化通俗作品。

三是立意高远，视角宏大。文库从廉政文化的基本属性和基本作用着眼，创造性地将丛书分为基本理论、道德修养、通俗读物三卷，全方位满足读者对于廉政文化的多层次需求。

四是内容丰富，知识性强。文库 18 册图书洋洋数百万言，既有关于廉政文化的基础性阐释，又有反腐倡廉领域前沿问题研究，还有相关的普及性读物，对廉政文化进行了多

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展示。

五是形式新颖，体例灵活，兼顾趣味性、可读性。文库编写体例根据各卷和分册的具体内容灵活掌握，语言风格不强求统一，而是根据每个选题的特色，确定相应的体例，从而使每本图书都以最便于阅读的形式呈现出来。以通俗读物卷为例，涵盖故事、诗词、漫画等多种形式，有助于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

希望本文库的出版能够为廉政文化建设实践提供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有力的理论支撑，对廉政文化的传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后，我们将继续跟踪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不断吸收、推出新成果，以使本文库更加丰富和完善。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4年3月

目 录

上 篇

第一 章	“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	(3)
第二 章	信仰断裂	(24)
第三 章	物欲的诱惑	(33)
第四 章	人性的弱点	(42)
第五 章	色戒	(54)
第六 章	浮世绘	(62)
第七 章	贪官累	(73)
第八 章	要对腐败零容忍	(91)

下 篇

第九 章	皇帝如何反贪	(105)
第十 章	漫谈清官	(122)
第十一章	编织权力栅栏	(134)
第十二章	不可轻视的“外力”	(147)
第十三章	官薪与腐败	(163)
第十四章	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教育官员	(179)

上 篇

第一章 “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

郭沫若的不少论著和史学观点曾引起学界争论，比如扬李（白）抑杜（甫）、古史分期、《胡笳十八拍》的创作权等，包括名声很大的《甲申三百年祭》。自 1944 年郭氏写此书到现在，又一个甲申年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或用做于“干部必读”，或列为党校教材，久行不辍，对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也争论不断。不光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大家熟悉，当年国民党也组织文人对这本书进行过口诛笔伐。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也是不多的。

毛泽东盛赞郭老此书，并以之作为延安干部整风的读物，其意当鉴于李自成大军入京后所犯错误，以告诫全党不可忘乎所以，这和他重视黄炎培向他提醒的一句警语：“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亦是同理，只不过郭文更具形象罢了。今天，《甲申三百年祭》一书，还是反腐败研究中被大家经常引用的经典。

我对郭文也颇喜欢，经常翻看。文中这样一段文字颇有意思，这是郭文转引的资料，源于《剿闯小史》：

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军李岩私步出长安门外，见先帝柩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日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

宋曰：“彼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

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也？”

宋曰：“明朝国政，误在重科制，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科制之不得人也。而旧任老臣又曰：‘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此地位，大臣非只我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不相关也。”

其时，李自成大军刚刚入北京城。大将刘宗敏在吴宅搞绑票，逼得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丞相”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宋献策（引文中的宋矮子）、李岩是李自成队伍中头脑比较清醒的。战火还没熄灭，已经在思考后人所说的“赶考”问题了。

纱帽（官员）本来是政权的维护者，满朝公卿谁不享受朝廷高爵厚禄，怎么国家有事不为之效力，反而争先恐后地举起白旗呢。不要说对旧主子的感恩，连起码的人情也不顾，崇祯上吊时，只有一个太监在身边。满朝文武都到哪里去了，不但不救驾，“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先主尸骨未寒，都已争先恐后入新朝拜新主了。

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原因很多。宋献策认为，误在重科举制，循资格。这里涉及了官员选拔制度和官员质量的关系。宋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出不了良吏，只能出劣官、出贪官。

二

一百多年前，具体说来是 1905 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一年的 9 月 2 日（阴历八月初四），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

大臣的袁世凯等六疆臣给清廷上了道奏折，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清廷诏准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亦即停止。袁世凯是旧式人物，一脑瓜子封建迷信，此时的清廷更是腐朽的像座快要塌了的破庙，怎么会如此大胆创新，把中国千年的老例给改了，动了中国政治体制的根基，这在现在看来也是大气魄、大手笔。其实，当时这样做是时代潮流使然，大势所趋，是当政者不得不做的事。不过，制度是废了，可是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这延续了1300年的封建社会头号制度，是耶非耶，至今还争论不休。2005年，恰逢废除科举制一百年，学界曾有一次集中的争论。争论的一致结论当然是没有的，在众说纷纭中有一点倒是大家认可的，那就是科举制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而且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选官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必然与官场体制、官场政治联系在一起，也与中国官场中的历史通病——腐败密不可分。

中国的科举制创立于隋。隋前的魏晋时期，还是一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门第观念很深的社会。那时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者的官员任“中正”。中正以家世、道德、才能为标准查访评定人才，将他们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朝廷用人的依据。这种用人制度最大的弊病是讲门第，即“血统论”。选用人时，家世是第一位的。魏晋后期，随着社会发展，中下层的中小地主成为一股新兴力量，他们有了政治诉求，希望走上政治舞台。统治者从巩固政权角度考虑，也试图淡化社会等级界限，改革用人办法。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规定采用考试方法选择官吏，科举制诞生了。“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平民通往权力中枢的路开通了，科举制使穷酸书生，在一夜之间翻身成为了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于连的野心在欧洲贵族国家只是欲望，在我们这儿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了。

科举之妙，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太宗站在城楼上，看考生鱼贯而进入考场，捋着胡子，高兴地说出了这句名言。科

举制的施行，实现了对士人阶层，并由士人阶层扩展到整个社会阶层的有效驾驭。“天下英雄”统统入轨，纳入体制内，别的道路走不通。这是防止知识分子不轨的一个釜底抽薪的好办法，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力大大加强了。

科举制建立在儒家文化的坚实基础上，迎合了士子的个人奋斗愿望。从表面上看，人人平等，人人都有盼头，赢了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输了是你自己不努力的结果，怨不得谁。“天下英雄”都赶上了这座独木桥，一方面是挤得大部分都掉下河去，另一方面是没有其他路可走，明知通过这座独木桥的可能性很小，也只能往上挤。你想另辟蹊径，只能成为另类，社会不认可。就像现在单位录用人，正规学历是第一条，你说我没上过大学，但本事很大，谁认可你，人家会问，你本事很大，为什么没考上大学？

从表面上看，科考内容主要是经义，是儒家那一套东西。儒家讲的是道德，重在“德育”。十年寒窗，“吾日三省吾身”，保证良好的品行应该没问题了。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士子读书的目的并不是修身，而是功名，为做官，为发财。就像《官场现形记》中方氏家塾的那位先生所说的那样：“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入翰林，好处多着哩！”“入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大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读书，入考，当官，发财，千百年来，中国人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士人学子付诸行动，普通民众的脑子里也是认可这条路是正统，其余的路都是旁门左道。

科举制使中国人当官发财的欲望成为可能，反过来，又加深了中国人的当官发财思想。当官发财，天经地义，中国人老说要统一思想，就当官发财这一点来说，最能统一国人思想，不但尽人皆知，而且占据大脑的最深层。1916年，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在《新青年》中以犀利笔触写道：

“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

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

做官发财思想是万恶之源。陈独秀分析认为：“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结果是“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

“做官发财”这一观念已演化为我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思维定式，成为国民心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阻碍我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负面心理因素。芸芸众生往往陷入对“做官发财”既痛恨又羡慕的怪圈——痛恨正在“发财”的贪官污吏，同时又在羡慕中梦想有朝一日，风水轮流转，我也同样发大财。因此，欲塑造现代之国民，必根除这种“做官发财”的传统意识。那么，科举制何以导致升官发财观念？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

三

从入馆求师到求考，这条唯一通道狭窄又漫长。每三年全国才录300进士，不要说走到顶端，到天子堂去殿试，去争那么几个状元、探花、榜眼，就是考到举人，也是漫漫长夜路，其间需要大量投入。

中国两千多年是宗法家族制度的社会，其突出的特点就是血缘关系处于人际关系的中心。在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中，政务、家务的运作均以血缘关系为枢纽。这一特点表现在家族一面，就是家族成员与整个家族的牢固关系。每一个家族都希望自己的家族兴旺，家族兴旺发达的标志就是在科考中有没有人出人头地，有多少人当官，当过多大的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要说出了一个状元郎，出榜眼、探花，就是出个举人，儿孙几辈子人，七姑八姨都可沾光。这样，从表面上看是一个

学子在读书赶考，背后却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往往集中了一个家族的经济力量和精神企盼。财力是基础，起码是小康殷实家族才能支撑得起，常常是一个家族多年，甚至几代人的积蓄掷于一个学子身上，一般的农民之家根本负担不起。

别的不说，如果能上京城赶考，仅路费就是一笔大开支。那时的交通不像现在，其间的艰难是今人难以想像的。现在北京到广州，飞机只飞三小时，当年林则徐受命禁烟，从北京到广州整整走了六十一天，那还是坐着马车的，你想想穷书生从南方来一趟京城有多难。

寒窗十年，其苦楚不用说了，过一场考试就得扒一层皮。当时各省考试的地方叫“贡院”，一个贡院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参考，人文繁盛的江南贡院，到清末时最多号舍有两万多间。贡院设三道门，是进行搜检的通道。贡院四周高墙围住，围墙上有荆棘，进考场就如关进了监狱。杭州的贡院还三面环河，防范之制甚是严密。每人一个格子笼，“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士”。贡院中建一高楼，叫明远楼，三层楼高。考官居高临下眺望，全考场情况一览无余。清代词人李笠翁曾为明远楼写对联：“距今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嚣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那恰似现代监狱了，事实上管考生和管犯人是一样的。

《聊斋志异》中《王子安》中还有这样的比喻：

“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神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

真是“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字功名误煞人。”一些士子无法忍受乞丐般的科场生活，因此走上绝路。光绪壬寅科浙江乡试，“闻场中考生死者三人。一人死于蛇，一人烛签自刺，一自碎其睾丸。”

身上的苦难还好说，还有磨人的“精神成本”。

明朝归有光有一篇著名的散文《项脊轩志》，描写自己当年寒舍苦读的情景。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亲情，读来催人泪下，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亲人望子成龙的急切心情。

“娘以指叩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

“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

老祖母已年迈之身，犹念念不忘孙儿他日能够继承祖业和重振家风。母亲慈爱，关怀备至，“以指叩门扉”，生怕惊动了苦读中的儿子。

归有光具才气，可是仕途却很不得意，到35岁才中举，直到花甲之年才当了长兴知县。回想当年，“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贫士蹭蹬之情，跃然纸上。

日夜苦读，挨过考试，一路战战兢兢，伴随着长久的焦忧，临近发榜，不安的心情，那就活活要把人急死。古书中常有如此的描写：“急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红楼梦》的续作者高鹗写过一篇《荷叶杯》词：

盼断嫦娥佳信，更尽。小玉忽惊人，门外传来一新纸。真么真？真么真！

传神之笔写尽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惊恐之状。一个家族，像押宝一样，压在一篇三五百字的八股文上，还要加上科场的舞弊、考官的老眼昏花这档子事，如何才能榜上有名，真是令人胆战心惊，难怪范进要发疯。

《儒林外史》写范进中举，那是入了语文教程的：“抱着鸡，手里

插个草标，一步一踩的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卖”，当看到了中举捷报后，“看一遍，又念了一遍，自己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摔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忙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科考把人弄得神经兮兮。

四

中举了，甚至参加殿试，点了翰林，通向官场的门敲开了，但是并非立马授职入堂做官，“敲门砖”只是敲开了做官的第一道门，真正圆做官发财的梦还早着呢，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从制度上来说，所有的文官都要由朝廷吏部铨选，并定期让士子“掣签”（即抽签以定做官的省份）而后分发。因此，凡是要做官的士子必须到京城投供报到。一般来说，凡是到地方上任的，都要按吏部规定的“班次”候选。由于仕途杂进，做官的人多，候选的士子都要“候”一段时间，才能轮到掣签分发。新科进士归班选用知县，直到吏部查明前科进士将次用完，才能令其赴部投供，照原甲第名次先后挨选。

中国古代的官员可以分为两大类：职事官和散官。职事官有固定的编制，担任实际职务并行使一定权力；散官则没有定额，没有实际职务，也就没权力，这还不同于现在的“非领导职务”官员，它只是一种象征，也称阶官。《隋书·百官志》记：“居曹有职务者为职务官，无职务者为散官。”

由于历年累积，再加上“捐官”越来越多，花钱可以买官，于是修补的官员如过江之鲫。比如，清末四川一地，候补道员多至 50 多人，